

文学评奖忆故人

■金圣华

1998年出世的孩子——香港中文大学主办的“全球华文青年文学奖”，今年21岁了。回想21年前，刚刚筹划第一届文学奖的时候，我也曾经觉得泥足深陷，寸步难行。

当年，赤手空拳独自一人去筹募经费，当然是一大问题，最困难的还在如何激励全球在校的大学生去创作去投稿。刚开始时，身为筹委会主席，我不由得心志忐忑，惶惶不安，虽出尽全力，拼命推广，仍唯恐发出去的讯息，得不到半点回响；到截稿期近，征文文稿终于如雪片般飞来（那时不设网上投稿，稿件仍然是用邮寄的），看到大大小小的信封，多姿多彩的邮票，深深浅浅的字迹自世界各地蜂拥而至，的确深感振奋，激动不已，期盼过程中的患得患失和心情起落，早已不复介怀。

第一届文学奖于1998年启动，2000年颁奖，前后历时三年，时光飞逝，当年筹划过程中一些感人的片段却点滴在心头，久久难以忘怀。最为人津津乐道的当然是阵容强劲，有“九大行星”之称的终审评判，包括小说组的白先勇、王蒙、齐邦媛，散文组的林文月、余秋雨、柯灵，翻译组的余光中、杨宪益、高克毅（笔名乔志高）。这样的阵容，几乎囊括了海



首届全球华文青年文学奖颁奖典礼。左起：李景端、余光中、高克毅、金圣华。右起：林文月、齐邦媛、白先勇。

内外文坛译坛上的精英翘楚，绝对是可一而不可再的。

高克毅先生在文学奖推出时，曾经大力支持。这位住在美国佛罗里达州冬园市的翻译大家，不但为翻译组精心出题，而且在2000年第一届颁奖典礼举行时，偕夫人远道自美东来香港出席。那一年，他已经高龄八十有八了（俗称米寿），从美东到香港，如果直航，要花上十七八个小时，这哪

里是一个耄耋老人可以轻易对付的行程？于是，两老为了文学奖，只好先到加州略事休息，再继续旅程，就像候鸟一般，在漫漫长途先找一块栖息之地，再展翅飞翔。不但如此，他们还为我手提一块彩色玻璃的饰物，这件礼物真是“琉璃易碎”携带难，为的只是我年前在冬园访问期间，曾经于美术馆中对此璀璨夺目的物品投过一丝欣赏的眼光。20年后，念

及老人沿途的劳累与艰辛，待人的温厚与体贴，真是既于心不忍又感激不尽！

高先生的人品学问素为白先勇所敬重，因为他的推介，白先勇答应出任文学奖小说组终审评判，并且在刚接受完心脏大手术后，就“奋不顾身”从加州来到中文大学出席颁奖典礼，成为激励青年学子用中文创作的推动力。此后我和白先勇相知相交，喜结“牡丹缘”，都是拜高先生当年穿针引线所赐。

另一位常系心中的是杨宪益先生。1998年文学奖刚刚推出之时，邀约杨宪益出任终审评判，杨老（他喜欢我们叫他小杨）还兴致勃勃地接受，并一口答应到2000年颁奖典礼时跟夫人戴乃迭一起前来出席，谁知道1999年11月18日乃迭骤然去世，杨老痛失爱侣，哀伤莫名，所受打击之大实在是难以言喻。记得不久后我还特地到北京探访杨老，游说他前来香港出席盛典，说什么要收拾情怀，要多见老友多散心等等，可是

他怎么也提不起劲来。望着空荡荡、冷飕飕的公寓，形单影只、寂寞无告的老人，当时的我似乎还不太真正明白他心底的痛楚与煎熬，直至多年后自己丧失良伴，才体会到“早期比翼赴幽冥，不料中途失健翎”的感恻！

最感念的是余光中先生，他不但热烈推动文学奖，还积极出席盛典，一连几届，从不缺席，直至他于2016年不慎摔倒，才不得不退出评审工作。余先生更是文学奖的活水源头，在他七秩华诞的盛宴上，认识了实业家刘尚俭先生，由于刘先生的慷慨捐助，才使得第一届文学奖能够顺利推出。如今余光中先生已经飘然仙去了，颁奖礼上，再也看不到他的慈颜与笑容。当年文学奖诞生时倘若没有先生的助产，怎可能有今日茁壮成长的盛况？因此，第七届文学奖是特别以“向余光中先生致敬”为主题而开展的。

从第一届到第七届，历经21年的漫长时光，能坚持参与，始终不渝的同事，大有人在，尤其是第一届筹委会的郑宗义教授与何杏枫教授，如今依然为文学奖尽心尽力，何教授更担任第四届迄今的筹委会主席。在此，祝愿文学奖就像个活力充沛的年轻人，迈开脚步，好好走下去！

（上接第一版）这种异质文明的影响往往需要经过多次的传递才能成功。《黔之驴》的具体故事形态虽与天竺原典有多处承合影似，但细加比较仍有明显差别。再说，柳宗元未习梵文音义之学，他不可能去直接接触没有翻入中土的原典故事形态，更有可能他掌握到的是一个汉译佛经故事的文本。其情节构成要比天竺原典的记载更靠近《黔之驴》的样子，并在古印度传说与柳宗元《黔之驴》之间起着中介和传导的作用。

文汇读书周报：沿着季羨林先生的思路继续探索，您确定找到了上面所说的这个汉译佛经故事的文本吗？

陈允吉：是的，为寻找这一中介和传导作用的故事记载，让我耗费漫长时日，最后在藏经中找到西晋沙门法炬翻译的《佛说群牛譬经》一卷，其中就讲了一个有关驴的故事：

譬如群牛，志性调良，所至到处，择软草食，饮清凉水。时有一驴，便作是念：此诸群牛，志性调良，所至到处，择软草食，饮清凉水。我今亦可效彼，择软草食，饮清凉水。时彼驴，入群牛中，前脚踏土，触烧彼群牛，亦效群牛鸣吼，然不能改其声：“我亦是牛，我亦是牛！”然彼群牛，以角觚杀，而舍之去。

此中驴是故事主角，牛仅起陪衬作用，其与《五卷书》等故事集记载之传说有某种亲缘关系。但因传播之地、时不同，它的具体形态已发生了较多偏离，但在取材、主题及主干情节等方面，还保留着它承受自母胎的显著痕迹。

当然，《群牛譬经》的故事情节与其母体有所差别，但拿这些差别来和《黔之驴》相对照，恰好就成为它与《黔之驴》之间的相似点。一、两者均属纯粹动物寓言，驴都是被动物角色结果了性命；二、两篇寓言中的驴扮演庞然大物，都是因为缺乏自知之明；三、两篇之中的驴丢掉性命，均与踢了对方一脚相关；四、两者结尾对事态的描摹如出一辙。综合以上数点研究，可知《佛说群牛譬经》这一汉译佛典寓言，不但

由于经过翻译消除了语言障碍而易为柳宗元所阅读，其多数地方与《黔之驴》的相似重合也比天竺原典的记载要更进一步。足见《群牛譬经》确实充当了一个中介、传导因素，其文本藉沙门法炬之翻译而在中华得到流传，越数百年后终于促成了一篇中国寓言杰作的诞生。柳宗元撰作《黔之驴》这个寓言故事，与其说是对天竺原典的遥远袭袭，还不如说是受了《群牛譬经》译文直接的启发影响。

文汇读书周报：怎么知道柳宗元一定看过《佛说群牛譬经》呢，您有确凿的证据吗？

陈允吉：柳宗元的确看到过《佛说群牛譬经》。这从他文集里就能找到有力的旁证。柳集有《牛赋》一篇，两个角色同样是驴和牛，其原经译文云：

不如羸驴，服逐弩马，曲意随势，不择处所。不耕不驾，藿菽自与，腾踏康庄，出入轻举。喜则齐鼻，怒则奋蹄，当道长鸣，闻者惊辟。

此赋之写作年代与《黔之驴》大略相当，同为柳宗元贬斥永州精神上受到极度压抑的产物，两者不仅角色配置相同，连爱憎褒贬和审美评价亦完全一致，且多处细节描绘殊相仿佛。如《牛赋》中所谓的“怒则奋蹄”，即《黔之驴》写的“驴不胜怒，蹄之”；而《黔之驴》有关“驴一鸣，虎大骇远遁”的描述，与《牛赋》“当道长鸣，闻者惊辟”事状亦宛然相似。我们有充分理由肯定《牛赋》与《黔之驴》两篇系同出于作者遭贬永州时期读了《群牛譬经》后写出的姊妹篇。《佛说群牛譬经》乃是柳宗元创作《黔之驴》时所依据的主要蓝本。

当然，前面提到的《百喻经》中的《搗驴乳喻》对《黔之驴》的开头部分也有影响。两个寓言均围绕着驴来展开，而驴的对方产生的一切误会亦都是因为角色生在偏僻之地“不识于驴”。相似的行为出于相同的原因，故事的笑料总离不开一条外来的驴。要说这里面的传递影响之痕迹，那是最清楚不过了。

文汇读书周报：您所获得的这些认知

同季先生讨论过没有，是否得到了他本人的认可？

陈允吉：经较长时间酝酿和梳理，我将上述这些认知汇总起来，开始撰写《柳宗元寓言的佛经影响及〈黔之驴〉故事的渊源和由来》一文，进度异常缓慢。其间曾在一次学术会议上作过口头报告，书面文字则发表于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的《中华文史论丛》第四十六辑。考虑兹文之撰写，完全是在季羨林先生学术成果的启导下进行的，约在1991年春夏间，我将刊载该文的那册《中华文史论丛》邮寄给季先生，附信恳请他赐教指正，唯心中尚不免惶惶，生怕论文的什么地方讲了外行话。

过些时候就接到季老的复信：

允吉同志：
你的信和文章早已收到，但因我年老事繁，头绪过多，稍一疏忽，即易遗忘。所以到现在才写覆信，实在抱歉，务望原谅。事实上，在《中华文史论丛》的广告一在报纸上出现，我就注意到大作，不意竟蒙赐寄，实为雪中送炭之举，非常感激。

我那篇关于《黔之驴》的短文，搜集材料并不多，只是心有所感，立即命笔，后来也没有在这方面再继续进行探索。现读大作，材料丰富，论证明确，甚佩甚佩。我那篇短文，同大作一比，真如小巫之大巫了。

中印文学体裁和题材方面的交流影响，我们所知还相当少，在这方面还大有可为，光是《太平广记》中就能够找到不少。如果熟读佛经，再深入搜诸中国民间文学，必将有众多巨大发现，可以断言。

你其他有关这方面的文章，我也很感兴趣，只是搜求不易，如有多余副本，能赐寄一些，将感激无量矣。

即祝
近安

季羨林
1991.7.10

来信请寄北大东语系
季先生对我那篇论文的肯定，让我心里感到踏实一些，他作为一位前辈学者的恢宏大度，以及对晚辈、后学的亲切关怀，尤其令我敬佩折服，刚好此时我手头还有

几本三年前出版的拙作《唐音佛教辨思录》，就遵照先生的嘱咐寄了一本给他，不久又收到他的来信：

允吉同志：
来信和大著均已收到，谢谢！

我那篇关于《黔之驴》的短文，至多只不过是材料搜集，没有多少理论。你的文章则是体大思精，大大地开阔了我的眼界。你对我那篇短文评价过高，愧不敢当。

我读了《唐音佛教辨思录》中的第一篇谈王维“雪中芭蕉”的文章，立刻灵机一动，想到《歌德谈话录》中歌德的意见，觉得很有意义，动手写了一篇短文，题目叫《“高于自然”与“咏物言志”》。发表后当寄上请教。

集中其他文章还没有来得及细读。我相信，读了以后，一定会给我更多的启发。再一次致谢。

即祝
暑安

季羨林
1991.7.27

文汇读书周报：今年适逢季羨林先生逝世十周年，能简单地谈谈您对季先生为人、为学的感想吗？

陈允吉：季羨林先生是当代哲人、学林巨擘，他探明原始佛教的语言问题，全译印度古代史诗《罗摩衍那》，审定新疆出土的吐火罗文残卷为戏剧《弥勒会见记》，考溯蔗糖制作技术的驿递与东传，悉皆通津梵汉，放眼亚欧，阐释真知，起承绝学。其所撰《柳宗元〈黔之驴〉取材来源考》这篇文章，为一极具原创精神的开拓性论作，至于我跟随其后所做的一些搜寻，无非是沿着他的轨辙稍微作点延伸而已。如果没有他高瞻远瞩指点通径，我们对这些事情恐怕至今尚处于茫然无知之中。光阴如白驹过隙，弹指之间又过了30年，先生已在2009年7月离世，伊人告歿，率土衔悲。眼前我亦步入耄耋之年，颓龄思往事，犹常为此感动不已，谨将这段笔墨因缘讲述出来，藉其彰显前辈师长的行谊风范，以纪念季先生逝世十周年。